

研究論文

識「時務」者為俊傑： 晚清知識轉型與中國現代報刊的興起 (1896—1898)

卞冬磊

摘要

「書」與「報」，表徵兩種不同的知識系統和生產方式。本文將報刊媒介視作一種新知識類型，進而在晚清知識轉型中理解中國現代報刊的興起。研究發現，甲午以後，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發生了劇烈變動，文人群體從沉溺於儒學典籍，急切地轉向尋求關於「致用」和「現在」的知識。1896年起，對識「時務」者的迫切要求，使得晚清文人普遍地將報刊視作知識的來源。知識的「發明」，會催生思想世界的搖晃不安。本文認為，維新報刊的興盛，挑戰了傳統中國以儒學典籍為主導的知識和秩序。儘管，「時務」混雜了「傳統」和「現代」而具過渡色彩，但「時務」中蘊涵的「論政」，構成中國現代報刊最重要的精神氣質。報刊所建構的新時間，也使晚清文人從古典學問中脫離，轉而關注國家之「現在」，這一轉折是個體走向現代性的重要環節。

關鍵詞：時務、知識轉型、知識類型、報刊

卞冬磊，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研究興趣：中國新聞思想史。電郵：toto1982@126.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4年4月7日。論文接受日期：2014年11月20日。

Research Article

Shi “Shiwu” Zhe Wei Junji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in Late Ch’ing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Modern Newspapers, 1896–1898

Donglei BIAN

Abstract

Books and newspapers represent different knowledge systems. This article viewe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ewspap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Chinese literati class had an apparent shift from Confucian to the knowledge about “practical and current”. After 1896, in its pursuit of talented people, newspapers become the main resource of knowledge.

The subsequent invention of knowledge that resulted would inevitably have world shaking consequences. Modern newspapers deeply challenged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knowledge and the social order. As a temporary language, “Shiwu” mixe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ut political criticism constituted the important ethos of modern Chinese newspapers. The new time span created by newspapers also encouraged the Chinese literati to concentrate on the state, which, as is now evident, was a vital step to the conditions of modernity.

Donglei BIAN (Lecture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Keywords: Shiwu,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type of knowledge, newspaper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Bian, D. (2015). Shi “shiwu” zhe wei junji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in late Ch’ing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modern newspapers, 1896–1898.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2, 209–233.

鳴謝

本文受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青年學者訪問項目2014–2015」、教育部2013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閱讀公眾的興起：晚清報刊閱讀史研究(1894–1911)」(計畫編號：13YJC860003)資助。感謝本刊兩位匿名評審對文章的批評指正。

「作為學問的報刊」：晚清文人的認識論

竹內郁郎(1989:25)說：「識字的都市工人們，隨勞動條件改善、生活水準提高而逐漸成為巨大的資訊需求層，成為19世紀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登台的大眾報紙的幾萬乃至幾十萬讀者。」誠如其言，以刊登新聞為主、面向大眾的現代報紙，從根本而言是工業社會發展的結果，它的社會基礎形成於威廉斯(2013:188)所描述的以下三個過程：

首先是由工業化引起的生產和分發手段的巨大改進；其次是同樣由工業化引起的社會混亂，選舉權的擴大，以及追求民族的鬥爭；第三是作為報紙財政基礎的廣告制度的出現，它是一種新的經濟組織以及一個以不同方式組織起來的讀者群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而在帝制晚期的中國，報刊面對的識字人群，與西方讀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精神氣質——他們主要不是工商主義者，也非要求政治民主和經濟平等的中產階級，而是深受儒家文化薰染的文人學士。整體而言，他們排外守舊、輕視經濟，視經、史、子、集為學問的唯一信仰。起初，誕生於通商口岸、已略具現代色彩的新聞紙，因與學問無涉，便不曾對文人的精神世界產生重大影響。1890年前後，社會對於報紙的認識，仍如姚公鶴(1989:129)所回憶的，「不知報紙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閱報為子弟勸者」，因為「彼時社會以帖括為唯一學問，而報紙所載亦多瑣碎支離之記事，故雙方愈無接近之機會」。及至1894年，因海上戰事，《申報》雖已被廣泛閱讀，但日後一提起「滬上新聞紙」，類似「記載猥瑣、語多無稽、不學無術、無關宏旨」(陳寶箴，1897年5月12日)、「每一展讀大抵『滬濱冠蓋』、『瀛南春來』、『祝融肆虐』、『圖竊不成』、『晾散鴛鴦』、『甘為情死』等字樣闌塞紙面，千篇一律」(梁啟超，1901年12月1日)的大帽子仍會毫不留情地扣過來。

所以，晚清文人對外來的西方新聞紙從未表達過真正的敬意，他們對報紙態度的集體轉折，始於汪康年、梁啟超1896年創辦《時務報》。此前，北京與上海強學會曾出版《中外紀聞》與《強學報》，「但刊物散佈範圍和持續時間有限，它們實際運作的影響力遠不如接續在後的上海《時務報》」(李仁淵，2005:120)。《時務報》出版不久，作為官

方代表和讀書人典範的張之洞，公開宣稱《時務報》由「中國紳宦主持」，「識見正大、議論切要」，「有裨時政、有裨學術，為經世者不可少之編」（張之洞，1896年9月27日）。這一見識，契合了彼時的知識氛圍，促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撥全國性報刊讀者群的形成。隨後，「踵事而起者，乃有若《知新報》、《集成報》、《求是報》、《經世報》、《萃報》、《蘇報》、《湘報》等」（嚴復，1897年10月26日），讀報始成晚清文人的重要實踐。

除「去塞求通」的政治訴求外，晚清文人十分願意將「報」納入儒家學問體系中審視，既有如「為學當以史部各類為主，古今中外一切事蹟掌故及近時各報皆史類也。外國各書，朝廷已命人選譯久之，當有明文。今當以看報為主」（賀葆真，無出版時間）的正面肯定，也有報章雜誌「不知學問為何物」（王國維，1979：36-37）的負面評價。此種比附，恰切地將新事物嵌入舊學問，掃除了早期文人閱讀洋報紙時的心理障礙。即使到了1906年，學問深厚的孫寶瑄（1983：917）仍然強調：「報紙為今日一大學問，無論何人，皆當寓目，苟朋友相聚，語新聞而不知，引為大恥。」

如上，晚清文人認識報刊的心理狀態，就與西方的都市工人們不盡相同。如果說，以便士報為代表的西方大眾報紙是都市中產階級的「符號化」表達（舒德森，2009：48），較為關注資訊功能；那麼，晚清文人則偏愛用對待學問的態度理解報刊，他們對《時務報》等報刊突然而熱情的接納，同樣是一種自我表達，隱藏其後的是他們所急遽變化的知識觀。

報紙與知識：知識社會學的闡釋

報紙與知識的關係如何？

在尋常人的認識裏，知識往往是理論化、系統性和經得住時間考驗的智力產品。早期的知識社會學也只研究「那些或多或少被系統的論據所證明瞭的知識」，即「科學與哲學、經濟或政治思想領域的專家的精神產品」（默頓，2006：661）。因而，隨時間變動不息、支離破碎、只關注人間俗事的報紙，一般難以進入知識的殿堂。

隨着大眾世界和日常生活之意義的凸顯，另一種知識觀念逐漸嶄露頭角：在「高等」知識之外，還存在着一种常識性、隸屬大眾、每日運用卻不太值得言說的知識；因為，「不論科學的、哲學的甚或是神話的系統，都無法窮盡社會中的成員視為真實的事物」；何況，只有少數人才關心理論的詮釋，相反，「常識性的知識構成了各種意義的結構，離開它們，任何社會都無法存在。」(博格、盧克曼，2009：13)

如是，世上就存在兩類知識，簡言之，「一是系統化的專門知識，另一是大眾觀念和常識或日常知識。」(馬爾凱，2001：4)由於對知識的重新定義，現代報紙及其產品(新聞)常常被安置在日常知識的層面，即如塔奇曼(2008：172)所言，「新聞就像知識一樣，為定義和建構社會現實提供了一種框架」、「新聞生產者擁有生產知識的特權，其結果是使社會現狀合理化」。

相較於其他的日常知識，新聞定義和建構的社會現實有何特別之處？Park(1940)曾從「知識類型」的角度，給予新聞以明確定位。Park說，新聞屬於「知曉型」(acquaintance with)而非「理解型」(knowledge about)的知識，前者主要來自日常經歷、慣常做法甚至人的直覺，無須經過正式、系統的調查；後者則較為系統與理性，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和事實的檢驗。依此，Park一方面將新聞與自然科學區分開來，指出新聞是「一種具體的、依賴感性材料製作的知識形態」；同時又將之與歷史區分，認為新聞「涉及的往往是孤立的、當下的短期事件」。即如默多克(2006：38)所說，新聞「總是嚴格不懈地捕捉當前的現行思想。它聚焦重大事件，但卻忽視法國歷史學家斐迪南·布朗代爾稱之為“longue duree”的東西——在長長的時間環上展開的根深蒂固的各種變化的緩慢移動的趨勢」。

因而，新聞作為知識的獨特性就在於時間上的「短暫易逝」，其特別的功能是要引導人們在一個現實世界(an actual world)中進行自我定位(Park, 1940, p. 669；黃旦，2005：105-106)。

新聞是現代報紙的表徵。Park的文章，明確了報紙對知識的形塑，頗接近新近興起的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的認知：「每一種媒介都為思考、表達思想和抒發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報刊是一種隱喻，它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內容，從而最終能控制住文化——

「用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波茲曼, 2009: 10–11)。從這個層面審視, 「書」與「報」, 就表徵着兩種不同的知識系統和生產方式(黃旦, 2014), 它們的差異不在於外在的物質形式, 而是所規範的知識類型, 恰如塔爾德(2005: 237)對「書」與「報」的比較: 「雖然書籍使操同一語言的讀書人都感覺到同一的語文身份, 但是它們並不關心當前令人興奮的問題, ……激勵民族活力並使之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 正是每天波動的情況。」換言之, 報紙具有關心當下的時間性。

「新聞作為一種知識類型」(news as an type of knowledge), 是基於西方現代報業基礎上的觀察, 其環境與中國現代報刊所處的歷史語境差異甚大。但它作為一個理論, 提供了一個視角, 使我們站在知識/學問的層面審視中國現代報刊成為可能。具體而言, 1896年起, 《時務報》掀起了中國文人自辦報刊的第一個高潮, 數十種報刊創辦發行, 一個遍佈全國的報刊讀者群正在形成, 與之相伴隨的, 是以儒學典籍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學問所遭受的質疑和沒落。這一此消彼長的現象, 指引我們去審視近代中國知識的競爭和纏繞。

中國傳統知識的地圖

書是傳統社會保存知識的主要媒介。明清以來, 書籍出版市場以各類儒學典籍、家用百科全書和通俗讀物作為重點(包筠雅, 2008)。其中, 掌握儒學經典是文人的基本教養。此外, 晚明時期繁榮的出版業, 還在江南地區生產出一種「實踐的、基本指導的」新知識形式——「從最安全的旅行路線, 到運用於房產契約中的條款, 再到恰當地嫖妓和光顧賭場」, 這樣一個為「實際知識服務的新市場刺激了坊刻業, 提供了儒家經典所沒有的知識」(高彥頤, 2005: 36)。另外, 一直流傳於民間的還有「通俗讀物」, 特別是如《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白話小說, 它們廣受歡迎, 被識字階層作為日常生活的調劑。

儒學典籍的傳播與閱讀

儒學典籍是帝制中國最重要的知識。早在19世紀, 《紐約時報》就

曾報導說：「四書五經維繫着清國靈魂，……書本知識在大清國民間的傳播很可能比在其他任何民族人民間的傳播更加廣泛。」(鄭曦原、李方惠與胡書源，2011：101)那麼，這些經典包含哪些內容？如何被閱讀？

我們先用一個讀書人的早期經歷來回答這一問題，清代人顧祖誥回憶：

五歲……識字，讀書是年始終。六歲讀畢《論語》。七歲授《孟子》、《詩經》。八歲授《書經》、《禮記》。九歲授……《易經》、《春秋》。十歲《春秋》讀畢。十一歲……授《古文觀止》。十二歲教以詩、古文、詞、明文必自集，學作散體詩。十三歲教以小題，正鵠、學作八股文字。十四歲學有進步，始告完篇。十五歲應童子試。(轉引自張仲禮，2008：138)

上述圖景是帝制中國時代，致力科舉之人最尋常的少年生活。那麼，完成啟蒙教育、功成名就的飽學之士，其閱讀生活又是如何？僅以孫寶瑄1893年的日記為例：

十一月初二，讀《左傳》，閱《明紀》、讀謝希逸《月賦》、觀郭景純《遊仙詩》、左太沖《招隱詩》及謝康樂諸紀遊詩；初三日，溫《左傳》、閱《明紀》，兼閱《明史》，讀《月賦》成誦，閱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詩、劉公幹《贈從弟》詩。初五日，讀《左傳》、觀《明紀》、兼閱《明史》、讀孔德璋《北山移文》、觀陳思王《贈徐幹》等詩。(孫寶瑄，1983：1)

此處截取的只是文人漫長讀書生涯的一小片段，但已能顯示其閱讀範圍大抵不脫經書、歷史、詩賦的領域，孫寶瑄所留下的《忘山廬日記》，通篇充滿對儒學典籍的閱讀、抄寫甚至背誦。日本學者三石善吉(1999：29)因而指出，中國文人的這種閱讀方式，是「不離古典的生活，可以說是致力於把有如空氣一般的儒學經典變得更加日常化、具體化」。

日用知識和通俗讀物的出版與閱讀

日用知識是儒學典籍之外，遍佈於社會的另一種知識類型，它處理民眾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實際事務，如曆書、占卜、演算、農業、育兒、棋譜等。王正華(2003：35)發現，明代的日用知識顯而易見地增加了人際交往內容，如稱呼方式、書簡格式、娛樂應酬、助談之資、青樓規範等，已從偏向問學進修的鄉村生活轉向城市，「它存在於一個巨大的人際網路中，交織的是人情世故，是場面交際，而不是縉紳家業、文學求道和生活上的實際問題」。

在想像中，日用書籍的閱讀者以下層民眾為主，但現有研究證明，它的讀者遍佈社會各個階層。包筠雅(1999：233)發現，明末清初「功過格」一類的善書，其最重要的讀者是文人精英，還包括地位非常低的士人、商人、著名官員。大木康(1988：206)也精確地界定出，馮夢龍的「尺牘類」作品，主要讀者是「中下層的士(一般指童生和生員)和商人」。

通俗讀物一直是書籍出版市場的暢銷品。清代人鄭光祖(1990：42)曾記載：「偶於書攤見有書賈記數一冊，云：是歲所銷之書，『致富奇書』若干，《紅樓夢》、《金瓶梅》、《水滸》、《西廂》等書稱是。」就閱讀而言，日本學者磯部彰推斷，「以內府為頂點的官僚群、讀書人、富商和鄉紳地主等，是集中於經濟、時間等方面均十分富裕的階層，尤其是官僚讀書人階層，是(明代《西遊記》)主要的讀者」(轉引自大木康，1988：201)。但大木康認為，明末白話小說的讀者，應是「以生員為中心的應舉士子及生員以上階層的人士」(大木康，1988：209)。

以上，簡要勾勒了中國傳統知識的地圖，三類知識各司其職，調節着社會秩序。文人階層以儒學典籍為立身之本，獲得較為顯著的社會地位；其他識字人群依靠日用知識維持生產，以通俗讀物作為娛樂。不過，中國傳統社會的重心始終由儒學典籍來定義，則是毫無疑問的，人們的生活框架大抵不脫其所安排的時空、文化和秩序。

儒學知識在晚清遭遇的困境

甲午戰敗以後，晚清社會陷入了急遽的變化和強烈的自我反思中。面對日本的現代性力量，文人群體以近乎本能的方式，試圖從儒學經典中尋找答案，但那些一成不變的典籍無法再次給予回答。近代中國從對西學的不屑一顧、到「中體西用」的折衷心態、再到「五四」時對傳統的全面否定，顯示了儒學經典節節敗退的命運。這種失敗並非偶然，而是根源於儒學知識自身的特性。

難以「致用」

儒學典籍是一個宏偉的知識體系，關於中國人與社會的各種問題之解答都曾包含其中。佐藤慎一(2006：12-13)指出，19世紀的中國士大夫盡其所能、傾其所學而為的正是尋找答案的過程，可是他們雖然提出了無數的對策，但是終究不能找到確切的解答，因為「經過產業革命與政治革命而成長起來的西方諸國的力量——政治力、經歷力與軍事力——在人類歷史上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如何翻閱中國的古典也不可能找出確切的答案來」。

所謂政治力、經濟力與軍事力的知識，一言以蔽之，就是現代性知識。船堅炮利、工商貿易、議員選舉，這些現代社會的事物在儒學典籍中均不曾出現。「君子不器」，文人士大夫從來都是人文主義者，學問的價值就在於學問自身，並且由於科舉考試制度，它更適宜於「美學上的空發議論，而不是實踐上的貫徹執行」，如列文森(2009：14)所說：

如果官員的知識結構具有職業性、技術性和有用性的特點，那麼這種知識僅僅是一種謀職的手段，而不具有使官員獲得尊重的內在功能。但當官職被用來象徵高的文化、知識和文明的終極價值時，做官就明顯地要優越於其他社會角色，其他任何一種成就(軍事的、商業的、技術的)，只要被認為是靠某種專業知識而獲得的，其榮譽就不能和獲得官職的榮譽相比。

在這種知識觀念之下，文人士大夫從儒學經典中得到的就不是專業性的、實踐的知識，而是文學或哲學，它們以偏向審美的特性造就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精英——文人群體。

忽視「現在」

與本文主旨更為密切的是，總是從一成不變的儒學經典中獲得知識、解決問題的成功經驗，使文人的精神世界裏，根本缺乏關於「現在」的知識。他們在遭遇新事物、新情況時，只會習慣性地從古典中尋找依據。

面對近代中國社會的變化，文人學士應因現實、尋求出路的目標不在未來、不在西方，而在古時三代，就貯藏於經典之中。所以，咸豐元年的曾國藩，雖「兼攝刑曹，職務繁委」，仍「退食之暇，手不釋卷」，而深以為「經世之道不出故紙堆中」，「比之龔自珍『藥方只販古時丹』，正可以見同一種文化造成的同一種社會心理」（楊國強，2008：27）。

文人的這種心理取向和處事態度可以被概括為面向過去的「保守主義」，它源於這樣的一種觀念：「個人從屬於某種持續的、先在的社會秩序，這一事實在決定人們何去何從時是最最重要的」（斯克拉頓，2005：7）。保守主義的表達方式，在文人群體身上的體現，就是「把歷史視為其信仰的核心依據，視為其信念得以傳達的基本媒介」，因為他們相信，「在古典文獻中有關於黃金時代的確鑿無疑的證據，這證據即使不是歷史的，也是道德的」。（格里德爾，2010：17）

這一以過去為依據的傳統，使「過去」成為生命的尺度。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均依賴過去的記錄，依賴經典所固化的知識。因此，不僅是掌握這種知識的人沾染了保守主義的態度，「在現實裏看過去，在過去裏體驗現在」，而產生一種「無時間意識的、歷史空間等同於所有空間的心態」（三石善吉，1999：129）；儒學知識本身就拒斥變化和創新，由於它在安常處順之時，在應付社會問題時屢試不爽，因而獲得了強大的保存自身的能力。不過，當遭遇人類歷史都不曾有過的現代性之新情況時，它就不再那麼有效。

「識時務者為俊傑」：清末人才觀念的變革

曼海姆(2009)說，在一個時代或者一個具體的社會歷史集團(比如階級)思維的總體結構特徵成為「意識形態」時，總存有一種或數種思想狀態與所在現實狀況不相協調，謂之「烏托邦」。19世紀初期，儒學的經世思想正從壓抑狀態中走出來，這是一個「持續了幾個世紀之久，希冀從形而上學的、心理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困境中擺脫出來的強烈願望，引導許多中國人滿腔熱情地獻身於他們原本所尊重的制度而接受生疏的外國方式的事業」(列文森，1965：14)。

經世本是儒學的一脈，宋代王安石因改革失敗而有「經世才難就」的感慨，是「經世理想在政治領域內碰到的第一個大挫折」，及至明代以來，「中國專制傳統發展到最高峰，儒者不能行道於外，只有藏其心於內，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遭遇，但儒家並未完全喪失其原始的用的衝動，因此每當政治危機深化之際，經世的觀念便開始抬頭，明末與清末都是顯例」(余英時，2004：448)。

由於乾隆朝後期的衰落，經世思想早在19世紀20年代即開始崛起，攜帶着「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實際地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安寧和繁榮的道義責任感」，它試圖在挽救王朝衰落方面有所作為。在《皇朝經世文編》的序言中，魏源指出，經世派「心必有驗於事」、「古必有驗於今」，即「強調現在和強調致用的重要性」(費正清、劉廣京，2007：144)。

在這一思想底色下，從徒事空文的學問世界中解放出來的願望開始走向前台。積累到甲午戰敗，朝野之間迅速地達成共識，文人群體終於開始全面回應知識的危機，並形成一種新的「人才觀」，即一味沉溺儒學典籍、為應付科考而從事帖括小楷的人已不堪一用，帝國的振興需要「識時務」的頭腦。

何謂「識時務」？《三國志》早就有「儒生俗吏，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的說法(陳壽，2010：73)。「識時務」，大抵指可以根據時機、形勢或時代潮流，做出正確的選擇。此外，「時務」還有一個更為狹窄、但十分重要的意義，即「時政」。咸豐六年，陝西考生黃雲瑞呈遞奏本，違反了帝國禁止布衣上書的政令，被責斥為「擅自進京，妄陳

時務」(轉引自張仲禮, 2008: 147)。所以, 當汪康年將報紙命名為「時務報」時, 引得同仁擔心他過於鋒芒畢露, 諄諄告誡其出言須謹慎。

據王爾敏(2002: 451)研究, 自光緒年起, 有識之士就開始重視「時務」, 甲午戰後, 陝西學政率先開設「時務齋」:「齋名時務, 自治身心, 正救時之本原, 留心天下國家, 尤救時之急務也」; 汪康年、梁啟超於隨後創辦《時務報》; 1897年, 湖南巡撫陳寶箴創辦「時務學堂」, 「時務」一詞遂成朝野熱門口號。

維新期間, 「時務」承擔了許多重要的任務, 成為一個包含時事、論述、西政、實學等多種知識門類的混合體。僅以科舉參考書《時務目論》為例, 其搜羅篇目大約包含〈論礦利〉、〈論振興絲茶〉、〈論中國宜興農學會〉、〈論中國富民之無術〉、〈論教案之迭出之由〉、〈論報館之益〉之類, 可見「時務」具有關注社會實際事務的特質(劉龍心, 2007)。彼時, 「識時務」已成為人的基本素養, 甚至具有裝點門面的效果。1902年, 一位在科舉考場外的賣書人曾記錄, 「每有買書者來, 其昂然直入之際, 意氣甚盛, 及察知吾輩亦為其同類也, 則容態驟變。蓋意吾輩從上海來, 必能通知時務, 冀幸場屋之或一通, 可從而求救也」(公奴, 2003: 392), 「時務」之流行可見一斑。

晚清文人對「時務」的提倡, 顯示了他們知識觀念的更迭, 其深層動因則來自於對新式人才的渴望, 即如「時務齋」主人劉光蕘的期待, 「爰立時務齋於味經書院, 俾人人心目有當時之務, 而以求其補救之術於經史。人人出而有用中國之勢, 孔孟之教未必不可雄駕諸洲也」(轉引自王爾敏, 2002: 446)。

「讀書博古、讀報通今」: 報刊作為「時務」的來源

如果「時務」只是一種實用性知識, 那麼只需閱讀西書、參考「時務彙編」等資料、在學堂中耐心學習即可, 但「時務」的內涵不止於此, 它還具有對當下的濃厚關切和對時間的急切要求。當文人注意到這一點時, 就會在是時間性上考慮知識的傳播速度。與書相比, 報刊關注現在時的特性, 與傳統儒學典籍形成鮮明對比, 晚清文人正是在「讀書博古、讀報通今」的認知框架下, 將報刊視作「時務」知識的來源。

首先，通商口岸出現的新聞紙，很早就從「時間性」角度言說了報刊媒介的主體性，即有別於中國傳統書籍的「通今」色彩。1872年，《申報》創刊時寫到：「蓋古書之事，昔日之事；而新報之事，今日之事也。今日之事何便乎，蓋古書僅集前人之意以為今事之鑒；新聞則書今日之事，以見今人之才」（《申報》，1872年4月30日），已明確將「新報」與「古書」區分開來；1884年創作的【春江勝景圖】，其中涉及申報館，畫中題詩亦表達相似的含義：「文人但知古、通人也知今。一事不知儒者恥，會須一一羅胸襟。心胸上下五千年，筆墨縱橫九萬里，見聞歷歷備於此，讀之可驚復可喜。費去十文買一紙，博古通今從此時。」（轉引自張靜廬，2003：書影30）

其次，一些「口岸知識份子」亦較早地認識到報紙與書籍的差異。如《循環日報》主編王韜（1998：43）早就闡述過，「中國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國之士，通今而不知古，然士之欲用於世者，要以通今為先」。至甲午前夕，強調「讀報通今」的論述日趨集中，如何啟、胡禮垣（1994：145）說到：「思慮多從見聞而出，見聞多由日報而出。夫古典雖多，不合當今之務；舊聞莫罄，難為用世之資」，從而將書籍的「古典」與日報的「當今」對立起來。甲午之後，這類觀念已成共識，陝西開辦的「時務齋」，明確強調報章是「時務」知識的主要來源：

欲知時務，須多閱報章，《京報》、《申報》、《萬國公報》以及新出各報，時務齋均擬購一份，俾諸生分閱。而時務齋須設法購活字鉛版及印書器具一架，擇各報之有用者，每月排印一冊，散給時務齋諸生及會講各友，人各一冊。（王爾敏，2002：446）

第三，官方也在相似的邏輯下，提倡社會廣立報館和民眾廣閱報刊。1896年，李端棻闡釋新政五端，涉及報刊時，亦按着「讀書知古、讀報知今」、進而培養「通達時務」人才的邏輯逐步展開的：

知今而不知古則為俗士，知古而不知今則為婦孺。欲博古者莫如讀書，欲通今者莫如閱報，兩者相須而成，缺一不可。泰西每國報館……凡時局、政要、商務、兵機、新藝奇技、五洲所有事故，靡所不言。……今請京師及各省會，並通商口岸、繁盛鎮鋪，

成立大報館……則識時之俊日多、緯國之才日出矣。(李端棻，1997：24)

李端棻的奏摺被允准，象徵了朝廷對辦報的許可與對讀報的提倡。後經汪康年斡旋，張之洞同意在全省官銷《時務報》。〈鄂督張飭行全省官銷時務報箴〉一文在《時務報》上全文刊登，無形中成為報刊媒介擴散的廣告，飭箴讀報遂成官場的流行風氣。繼張之洞之後，包括浙江巡撫廖壽豐、嶽麓書院院長王先謙、保定太守陳啟泰等大小17名官員先後飭箴，鼓勵民眾讀報。他們的邏輯與李端棻、張之洞基本一致。僅以湖南巡撫陳寶箴為例，「古稱識時務者謂之俊傑，士子讀書稽古……第考古而不通今，所行必難合轍，故必周知當世之務」，而《時務報》「議論通明，所譯西報，尤多關係」，所以在湖南提倡閱報，可使「人才蔚興，當使不愧通材，周知四國，自應廣為流布，以開風氣而擴見聞」（陳寶箴，1897年5月12日）。

由此可見，晚清出現的提倡讀報現象，擁有一個共同的邏輯起點，即時勢日艱之際，社會亟需究心時事、通達時務之人。相應地，報刊和書籍往往被建構成互補或對立的知識來源——一種是關於過去的知識，中國古典書籍中充斥着此類學問，已不能應對現實問題；一種是關於現在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帝國從積弱走向富強的關鍵。因此，論述的邏輯終點最終均落在廣閱報刊。

維新報刊的發行與閱讀：以《時務報》為例

「讀報通今」的觀念在1870年代就已有跡可尋，但在甲午之前，報紙只是由洋人和下等文人生產、對國家意義不大的低級文化產品。及至甲午，追求「時務」的精神發酵出來，部分讀書人開始閱讀《萬國公報》和《申報》，但那仍是一種個人化的行為。晚清的文人真正將讀報視作閱讀生活的重要內容，是《時務報》創辦後才實現的。

一方面，在官方意識形態的鼓勵下，《時務報》的發行異常順利。在散佈於全國各地的各級官員、書院院長等文人精英的推動下，加之汪康年等人在基層腳踏實地的推銷，以及梁啟超富有鼓動性的筆觸，

《時務報》迅速地在全國18省75座城市、國外5城市中設立200多代派處，建立起廣泛而有效的發行網路。1896年下半年，《時務報》每期發行約7,000到9,000份，1897年上半年達到12,000份，下半年12,000至14,000份，1898年上半年約8,000至9,000份(廖梅，2001：69)。這是一個勢如破竹的過程，報刊迅速走進了文人的日常生活。

僅以《時務報》為例，它創造了一個由官員、士人群體和書院學生組成的文人讀者群，他們「分佈於江、浙、皖、湘、鄂、川等長江流域以及直隸、廣東一帶」，吸引了「上層、中層和中層偏下的士大夫，特別是中層士大夫，昭示了廣大中層士大夫是呼籲維新的主要力量」，可謂遍及全國(廖梅，2001：61-64)。此外，從《時務報》的捐款名單看，也遍佈文人內部的各個階層，既有高級官員，也有秀才、監生等下層士大夫，還有一些素不相識的讀者，如「常熟布衣」捐款「銀元三枚」、「東海居士助銀八元五角」，「從這些普通讀者的捐款贊助之舉，均可想見《時務報》對他們心靈所起的激蕩作用，顯示《時務報》的社會滲透力」(潘光哲，2005：64)。

如果說，1840年林則徐在廣州翻譯西方新聞紙，其背後充滿的是「指指點點的聒噪之聲」(黃旦，2012：76)；1876年郭嵩燾在赴英途中得到泰晤士報，「乃囑翻譯，錄成三折」，換來的結果卻是「環顧京師，知者掩飾，不知者狂迷，竟無從可以告語者」(郭嵩燾，1998：40-41)；那麼，1896年以後，讀報對文人來說，已不再是一件遮遮掩掩、形單影隻的事，翻閱晚清文人的日記，甲午之後，閱讀生活中增添了報紙這個新成員的，比比皆是。

如上所述，《時務報》培養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報刊讀者群，具有極為深遠的政治意義。這個「讀報共同體」的形成，自然離不開辦報者的苦心經營；但從知識的角度看，這也是讀書人對甲午以後急遽發生之知識轉型的急切回應。因此，《時務報》的成功可以看作是晚清文人群體的符號化表達。

結語及限制：「時務」與中國的現代性

從「時務」進入中國歷史場景，觀察報刊的興起與知識的纏繞，可

以為理解中國的現代性增加一個維度。

1896年，汪康年將報紙取名「時務」，儘管有些冒險，但絕不是偶然的際會，而是源於他對社會知識氛圍的切實感受。在清末，「時務」是一個包含了時事、論述、西政、實學等多種內容的混合體。一方面，西潮的進入，使其內涵呈現許多現代知識的特徵；另一方面，對現狀的急切反思與重建，又使其隱含了對時間的要求，促成了報刊媒介的正當化。它是中國現代知識體系尚未形成之際，晚清文人面對急遽變化時所使用的話語，具有傳統和現代混雜的過渡色彩。

「時務」中蘊涵的「時政」意義，被辦報的文人加以利用和發揚，深遠地影響了中國現代報刊的實踐。據陳寅恪(1982：148-149)說，維新时期有兩種思潮：一是陳寶箴推行的「歷練事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的變革，繼承的是同光以來的種種自強措施，如立學堂、講西學、辦實業、設工商局等；另一則是康有為推行的「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法」的「統籌全局」的變革，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兩條路徑。

回到1896年，雖然文人、辦報者和官員均曾在「識時務」的層面提倡讀報，但他們口中「時務」的意義未必等同。李端棻、張之洞顯然將報刊閱讀與「歷練事務」聯繫在一起，意在讓文人學子掌握實用知識。可梁啟超、汪康年的報紙卻在實踐中走向了「論政」，其原因是，他們不是職業官員，對實際事務既不擅長，也無興趣，所能做和善於做的，不過是漫無邊界地討論「中國應該向何處去」之類的問題，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政治討論，猶如18世紀的法國，「把文人安排在一種職務之中，……讓他們充當跟一切權力實踐無緣的士大夫學官角色，這本是職能上的混淆」。最終，法國文人「思出其位」，也轉向了「政治的幻想」(傅勒，2005：56)。

因此，《時務報》時常出現「民權」、「平等」、「議院」等字眼，「有神時政」的「時務」搖身變成離經叛道的「論政」，是邏輯上的必然。雖然「文人論政」本來就是儒家的精神所在，但借助報刊這一新式媒介，卻是「康有為、梁啟超和嚴復等新一代自改革者的發明」(朱維錚，2008：59)。此後，雖然商人和政黨相繼成為辦報的主體，但「論政」始終是中國現代報刊最重要的精神氣質。

在更為根本的意義上，維新時期的讀書人對時務的關注和對報紙

的接受，促進了他們自身的現代轉型。Daniel Woolf (2001, p. 82) 曾指出，中世紀的歐洲人，只能閱讀小說和歷史，因而普遍缺乏一種持續的、現在的概念，但15世紀以後，「新聞創生了持續的現在感，它在過去和未來之間刻畫出一個『去瞬時化的區域』(detemporalized zone)，……在這個區域裏，人們捲入正在進行中的事件，爭論且憂慮，並向求新意識和現代性邁出堅實的步伐」。從古典學問中逐漸走出的晚清文人群體，也發生了如斯變化。

最後需要交代的是，本文仍有一些未盡事宜。固然，從報刊作為特定知識類型的視角，觀察《時務報》的興起，並將之放在中國現代報刊的譜系中予以審視，有別於以往報刊史對這一問題進行的、偏重於政治化的解讀。然而，新視角也是一種新框架，可能也意味着某些局限。譬如，本文未能對「時務」進行內容分析，進而科學界定其確切內涵；在時間維度上，所觀察之知識的「博古」到「通今」之變，與中國近代知識轉型之長程歷史的勾連還相當薄弱。此外，本文多以時人「表達」為據，可能與歷史「實踐」存在一定偏差。總之，作為歷史研究，本文仍有「懸於空中」之感，未來當更多在近代知識轉型的歷史脈絡中理解中國現代報刊的興起，並更多地運用報刊文本，察看其中的知識，在何種程度上與本文所說的「時務」契合；同時，亦應在讀者的閱讀世界裏，分析報刊何以成為「時務」知識的來源，產生了甚麼樣的思想刺激。如此「深描」，或可進一步增加報刊史的豐富與複雜。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Chinese Section)

《申報》(1872年4月30日)。〈申江新報緣起〉。

Shen Bao (1872, April 30). *Shenjiang xinbao yuanqi*.

三石善吉(1999)。《傳統中國的內發性發展》(余項科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Sanshishanji (1999). *Chuantong zhongguo de neifaxing fazhan*. (Yu Xiangke Trans.). Beijing: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大木康(1988)。〈關於明末白話小說的作者和讀者〉。《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頁199-211。

- Da Mukang (1988). Guanyu mingmo baihua xiaoshuo de zuozhe he duzhe. *Mingqing xiaoshuo yanjiu*, 2, 199–211.
- 公奴(2003)。〈金陵實書記〉。張靜廬(編)，《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現代甲編)》(頁390–395)。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Gong Nu (2003). Jinling maishu ji. In Zhang Jinglu (Ed.), *Zhongguo jinxindai chuban shiliao (xiandai jiabian)* (pp. 390–395).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 王正華(2003)。〈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頁1–85。
- Wang Zhenghua (2003). Shenghuo, zhishi yu wenhua shangpin: Wanming Fujian ban “riyong leishu” yu qi shuhuamen.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jikan*, 41, 1–85.
- 王國維(1979)。《王國維文集(第3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Wang Guowei (1979). *Wang Guowei wenji (di 3 juan)*.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 王爾敏(2002)。《近代經世小儒》。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Wang Ermin (2002). *Jindai jingshi xiaoru*.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王爾敏(2006)。〈晚清實學所表現的學術轉型之過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頁1–22。
- Wang Ermin (2006). Wanqing shixue suo biao xian de xueshu zhuanxing zhi guodu.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jikan*, 52, 1–22.
- 王韜(1998)。《弢園文錄外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Wang Tao (1998). *Taoyuan wenlu waibian*. Zhengzhou: Zhongzhou guji chubanshe.
- 包筠雅(1999)。《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杜正貞，張林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原書Brokaw, C. [1991].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o Yunya (1999). *Gongguoge: Mingqing shehui de daode zhixu* (Du Zhengzhen, Zhang Lin Trans.). Hangzhou: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rokaw, C. [1991].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包筠雅(2008)。〈17–19世紀中國南部鄉村的書籍市場及文本的流傳〉。《清史譯叢》，第七輯，頁40–76。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Bao Yunya (2008). 17–19 Shiji zhongguo nanbu xiangcun de shuji shichang ji

- wenben de liuchuan. *Qingshi yicong*, 7, 40–76. Beijing :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 列文森 (2009) 。《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 。桂林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 Levenson, J. [1965].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ewensen (2009). *Rujiao zhongguo jiqi xiandai mingyun* (Zheng Dahua, Ren Jing Trans.).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Levenson, J. [1965].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朱維錚 (2008) 。《走出中世紀二集》。上海 : 復旦大學出版社。
- Zhu Weizheng (2008). *Zouchu zhongshiji erji*.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竹內郁郎 (1989) 。《大眾傳播社會學》(張國良譯) 。上海 : 復旦大學出版社。
- Zhuneiylang (1989). *Dazhong chuanbo shehuixue* (Zhang Guoliang Trans.).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佐藤慎一 (2006) 。《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文明》(劉嶽兵譯) 。南京 : 江蘇人民出版社。
- Zuotengshenyi (2006). *Jindai zhongguo de zhishifenzi he wenming* (Liu Yuebing Trans.).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 何啟、胡禮垣 (1994) 。《新政真詮》。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 He Qi, Hu Liyuan (1994). *Xinzheng Zhenquan*.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 余英時 (2004) 。《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桂林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Yu Yingshi (2004). *Zhongguo zhishiren zhishi de kaocha*.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李仁淵 (2005) 。《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台北 : 稻鄉出版社。
- Li Renyuan (2005). *Wanqing de xinshi chuanbo meiti yu zhishifenzi*. Taipei: Daoxiang chubanshe.
- 李端棻 (1997) 。〈奏請推廣學校設立譯局報館折〉。張之華 (編) , 《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頁 21–25) 。北京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Li Duanfen (1997). Zhouqing tuiguang xuexiao sheli yiju baoguan zhe. In Zhang Zhihua (Ed.). *Zhongguo xinwen shiyeshi wenxuan* (pp. 21–25).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波茲曼 (2009) 。《童年的消逝》(吳燕廷譯) 。桂林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 Postman, N. [1994].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New York: Vintage.)
- Boziman (2009). *Tongnian de xiaoshi* (Wu Yanting Trans.). Guilin: Guangxi shifan

-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Postman, N. [1994].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New York: Vintage.)
- 姚公鶴 (1989)。《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Yao Gonghe (1989). *Shanghai xianhua*.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威廉斯 (2013)。《漫長的革命》(倪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Williams, R.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 Weiliansi (2013). *Manchang de geming* (Ni Wei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Williams, R.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 孫寶瑄 (1983)。《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Sun Baoxuan (1983). *Wangshanlu rij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格里德爾 (2010)。《知識份子與現代中國》(單正平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Grieder, J. [1981].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 Gelide'er (2010). *Zhishifenzi yu xiandai zhongguo*. (Shan Zhengping Trans.).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Grieder, J. [1981].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馬爾凱 (2001)。《科學與知識社會學》(林聚任譯)。北京：東方出版社。(原書Mulkay, M. [1979].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Ma'erkai (2001). *Kexue yu zhishi shehuixue* (Lin Juren Trans.). Beijing: Dongfang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ulkay, M. [1979].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高彥頤 (2005)。《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Ko, D. [1994].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o yanyi (2005). *Guishushi: Mingmo qingchu jiangnan de cainv wenhua* (Li Zhisheng Trans.).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o, D. [1994].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張之洞 (1896年9月27日)。〈鄂督張飭行全省官銷時務報筭〉，《時務報》。
- Zhang Zhidong (1896, September 27). Erduzhang chi xing quansheng guanxiao shiwubao zha. *Shiwubao*.
- 張仲禮 (2008)。《中國紳士研究》(李榮昌，費成康，王寅通譯)。上海：上海人

- 民出版社。(原書 Chang C.-L. [1955].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Zhang Zhongli (2008). *Zhongguo shenshi yanjiu*. (Li Rongchang, Fei Chengkang, Wang Yinto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Chang C.-L. [1955].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曼海姆 (2009)。《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姚仁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書 Mannheim, K.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 Manhaimu (2009). *Yishi xingtai he wutuobang*. (Yao Renquan Trans.).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annheim, K.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 梁啟超 (1901年12月01日)。
〈本館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
- Liang Qichao (1901, December 1). Benguan yibaice zhuci bing lun baoguan zhi zeren ji benguan zhi jingli. *Qingyibao*.
- 郭嵩燾 (1998)。《使西紀程》。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
- Guo Songtao (1998). *Shixi jicheng*.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chubanshe.
- 陳寅恪 (1982)。《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Chen Yinque (1982). *Hanliutang j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陳壽 (2010)。《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
- Chen Shou (2010). *Sanguozhi · shushu · zhugeliang zhuan*. Beijing: Zhongguo fangzhi chubanshe.
- 陳寶箴 (1897年5月12日)。
〈湘撫陳購時務報發給全省各書院函〉。《時務報》。
- Chen Baozhen (1897.5.12). Xiangfuchen gou shiwubao fagei quansheng ge shuyuan zha. *ShiwuBao*.
- 傅勒 (2005)。《思考法國大革命》(孟明譯)。北京：三聯書店。(原書 Furet, F. [1981].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ule (2005). *Sikao faguo dageming* (Meng Ming Trans.).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Furet, F. [1981].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博格、盧克曼 (2009)。《現實的社會建構》(汪湧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Berger, P.,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 A treatise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Penguin University Press.)
- Boge, Lukeman (2009). *Xianshi de shehui jiangou* (Wang Yong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erger, P.,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Penguin University Press.)
- 斯科拉頓 (2005)。《保守主義的含義》(王皖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原書：Scruton, R. [1980]. *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 London: MacMillan.)
- Sikeladun (2005). *Baoshou zhuyi de hanyi* (Wang Wanqiang Trans.). Beijing: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cruton, R. [1980]. *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 London: MacMillan.)
- 舒德森 (2009)。《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陳昌鳳，常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Shudesen (2009). *Fajue xinwen: Meiguo baoye de shehuishi* (Chen Changfeng, Chang Jiang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費正清，劉廣京(編)(2007)。《劍橋中國晚清史(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書Fairbank, J., & Liu K.-C. [198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i Zhengqing, Liu Guangjing (Eds.) (2007). *Jianqiao zhongguo wanqingshi (xia)*.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lishi yanjiusuo bianyishi Trans.).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Fairbank, J., & Liu K.-C. [198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賀葆真(無出版資訊)。《賀葆真日記》。
- He Baozhen (wu chuban zixun). *He baozhen riji*.
- 黃旦(2014年9月)。《在「書」與「刊」之間：發明現代報刊》，「印刷與近代中國：第二屆傳播視野下的中國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上海。
- Huang Dan (2014.9). *Zai "shu" yu "kan" zhijian: Faming xiandai baokan*. "Yinshua yu jindai zhongguo: Di'erjie chuanbo shiye xia de zhongguo yanjiu xueshu yantaohui" lunwen. Shanghai.
- 黃旦(2005)。《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Huang Dan (2012). *Chuanzhe tuxiang: Xinwen zhuanye zhuyi de jiangou yu xiaojie*.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黃旦(2012)。<〈林則徐為何不辦報?〉。《新聞記者》，第1期，頁74-78。
- Huang Dan (2012). Linzexu weihe bu banbao? *Xinwen jizhe*, 1, 74-78.
- 塔奇曼(2008)。<《做新聞》(麻爭旗，劉笑盈，徐揚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原書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Taqiman (2008). *Zuo xinwen* (Ma Zhengqi, Liu Xiaoying, Xu Yang Tran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塔爾德(2005)。<《傳播與社會影響》(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Tarde, G. [1969]. *On communication and its social influ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a'erde (2005). *Chuanbo yu shehui yingxiang* (He Daokuan Trans.).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Tarde, G. [1969]. *On communication and its social influ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楊國強(2008)。<《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徊徨》。北京：三聯書店。
- Yang Guoqiang (2008). *Yili yu shigong zhijian de huihuang*.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 廖梅(2001)。<《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Liao Mei (2001). *Wang Kangnian: Cong minquanlun dao wenhua baoshou zhuy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劉龍心(2007)。<〈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頁105-139。
- Liu Longxin (2007). Cong keju dao xuetang: Celun yu wanqing de zhishi zhuanxing.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jikan*, 58, 105-139.
- 潘光哲(2005)。<〈時務報和它的讀者〉。《歷史研究》，第5期，頁60-83。
- Pan Guangzhe (2005). *Shiwubao he tade duzhe*. *Lishi yanjiu*, 5, 60-83.
- 鄭光祖(1990)。<《一斑錄雜述》。北京：中國書店。
- Zheng Guangzhu (1990). *Yibanlu zashu*. Beijing: Zhongguo shudian.
- 鄭曦原、李方惠、胡書源(編)(2011)。<《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 Zheng Xiyuan, Li Fanghui, Hu Shuyuan (Eds.). (2011). *Diguo de huiyi: Niuyue shibao wanqing guancha ji*. Beijing: Dangdai zhongguo chubanshe.

- 默多克 (2006)。〈以媒體為中介的現代性：傳媒與當代生活〉。《學術月刊》，第3期，頁66–72。
- Moduoke (2006). Yi meiti wei zhongjie de diandaixing: Chuanmei yu dangdai shenghuo. *Xueshu yuekan*, 3, 66–72.
- 默頓 (2006)。《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唐少傑、齊心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原書 Merton, R. [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IL: Free Press.)
- Modun (2006). *Shehui lilun he shehui jiegou*. (Tang Shaojie, Qi Xin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erton, R. [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IL: Free Press.)
- 嚴復 (1897年10月26日)。〈國聞報緣起〉，《國聞報》。
- Yan Fu (1897, October 26). Guowenbao yuanqi. *Guowen bao*.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Park, R. (1940).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45, 669–686.
- Woolf, D. (2001). News,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esen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D. Brendan & S. Baron (Eds.),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p. 80–118). New York: Routledge.

本文引用格式

- 卞冬磊 (2015)。〈識「時務」者為俊傑：晚清知識轉型與中國現代報刊的興起 (1896–1898)〉。《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2期，頁209–233。